

英国政党政治的演变与重构： 以脱欧为背景

李靖堃

内容提要:2013年1月,卡梅伦发表“脱欧”公投演说,英国随之进入“脱欧”时代。尽管脱欧的最终结果仍不明朗,但确定无疑的是,脱欧进程对英国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政党政治也不例外。“脱欧”不仅导致两个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内部的裂痕进一步加剧,而且造成其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激进化”迹象。与此同时,其他“第三党”的力量则呈现出增长态势,并对两大政党的政策和地位形成了冲击。在此背景下,英国的政党体制发生了新的演变,或许正在从典型的两党制向更具多元化和碎片化的方向发展,甚至有可能出现政党的分化组合。但是,目前尚无法确定这究竟是一种长期趋势,还是仅在“脱欧”这一特定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现象。

关键词:英国 脱欧 政党政治 多元化 碎片化

2013年1月,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发表“脱欧”公投演说,承诺如果保守党在下一届大选中获胜,将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此后,“脱欧”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2016年6月,英国民众在公投中以52%的比例赞成英国“脱欧”。2017年3月,英国向欧盟正式递交退出申请,并于当年6月与欧盟正式开始谈判。但此后“脱欧”进程一波三折,英国退出欧盟的时间也被推迟到2019年10月31日。本文截稿之时,英国能否在这一时间如期“脱欧”仍属未知数,但它对各个领域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在政党政治领域,其影响尤其显著。

与欧洲大陆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多党制不同,长期以来,英国一直被视为实行两党制的典型国家,特别是自现代政党制度形成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始终保持着两党轮流执政(保守党/自由党、保守党/工党)的模式。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自由民主党为代表的“第三党”间或对保守党和工党的垄断地位形成冲击和挑战,在

欧洲议会选举和地区议会选举中尤其明显。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如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英国政党政治领域的转型更加明显,特别是进入“脱欧时代”之后,这一过程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不仅两个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内部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而且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正在经历重构过程。同时,多个“第三党”力量的崛起以及有可能出现的政党重组和分化现象,不仅对两大政党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严峻挑战,长期存在的两党政治格局也处在渐进演变过程之中。尽管到目前为止,“第三党”尚未对两党制造成根本性或颠覆性的影响,但“两党制”的某些方面已经产生了动摇。而且,脱欧过程拖得越久,越有可能推动英国的政党政治格局走向多元化和碎片化。

一 保守党:脱欧加剧内部分裂

(一) 现象:针对脱欧方案的分歧加剧保守党内部分裂

保守党作为执政党也是脱欧公投的“始作俑者”。脱欧这一结果加剧了该党内部在欧洲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还有评论认为,如果出现极端情况,保守党甚至有可能解体。^①

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保守党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从未达成过一以贯之的统一立场,保守党总体上经历了从怀疑和观望到通过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抗衡,再到经过仔细权衡而不得不加入欧共体,乃至最终决定退出欧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始终伴随着疑欧情绪,同时其内部也始终存在意见分歧。

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决定申请加入欧共体的过程中,保守党内的极端人士代表鲍威尔(Enoch Powell)以及“反共同市场联盟”等党内组织就持强烈反对态度,鲍威尔甚至不惜以脱离保守党来捍卫其所信仰的“议会主权原则”。^②此后二十余年间,保守党总体上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建设,特别是单一市场建设,但党内始终存在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派别。到20世纪8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的对欧立场日趋强硬,但她的立场与保守党内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温和派成员意见相左,如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财政大臣劳森等人,并最终导致撒切尔夫人未能通过信任投票而黯然下台。在梅杰接任首相之后,“保守党对欧洲一体化政策上的内部分歧,逐渐上升成为党内最重要的

^① Natasha Frost, “Are the UK’s Two Leading Political Partie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ing?” May 6, 2019, <https://qz.com/1610210/could-brexit-kill-the-conservative-party/>, last accessed on 7 June 2019.

^② 谢峰:《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述评》,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6期,第28页。

原则之争”,^①从而直接导致保守党在1997年大选中失败。

2010年,保守党在野十三年之后重新上台执政,但内部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分歧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洲遇到的各种难题不仅加重了保守党内的疑欧情绪,也更加凸显了关于欧洲问题的分歧。例如,在2010年5月至2012年5月的议会期内,有93名保守党议员(占保守党议员总数的30%)在就欧洲一体化问题进行的29次投票中投了反对票。^②在这种形势下,卡梅伦不得不决定就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举行公投,旨在“一劳永逸”地解决党内分歧。但是,“脱欧”这一公投结果非但没有让保守党对欧洲问题产生更清晰的共同立场,反而引起了更多的混乱与分裂。不仅如此,随着脱欧进程的发展,保守党部分成员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也在向激进化甚至极端化方向发展,特别是“硬脱欧派”。

2010年之前,保守党大体上可分为“亲欧派”和“疑欧派”,且力量对比相差不大;但在2010年当选的议员中,只有七名保守党议员为亲欧派,其余绝大多数都为疑欧派。因此,原来在亲欧派与疑欧派之间的冲突已经演变为硬疑欧派与软疑欧派之间的冲突。^③前者为党内的极端右翼分子,观点更接近于英国独立党,强烈反对一体化,要求英国退出欧盟;后者则以前首相卡梅伦为代表,总体上支持一体化,但要求对欧盟进行改革。而在脱欧公投之后,这两派重新演化为硬脱欧派和软脱欧派,前者以现任英国首相约翰逊为首,主张无论能否与欧盟达成协议都要退出欧盟;而软脱欧派则希望在退出欧盟后仍然留在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二者的矛盾几乎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保守党始终无法就任何一种脱欧方案达成一致。在英国下院就脱欧协议举行的先后三次表决中,分别有118名、75名和34名保守党议员投了反对票(最后一次投票还是以特雷莎·梅承诺辞职为前提);在分别于2019年3月27日和4月1日就脱欧“备用方案”举行的“指示性投票”中,所有方案均被否决。对于其中的每一种方案,保守党议员的意见都不统一,致使无协议脱欧的风险大增,脱欧进程陷于停滞。此前,虽然保守党内部一直在欧洲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从未像当前这样严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依靠党内严明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人的威望压制分歧。然而,当前硬脱欧派与软脱欧派的任何一方似乎都不会妥协,缺乏达成共识、形成决议的基础。

这样的状况对保守党的影响十分恶劣。保守党内由于脱欧问题造成的矛盾不仅

^① 谢峰:《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述评》,第30页。

^② [英]菲利普·林奇、[英]理查德·惠特克:《意见不同,他们能否和谐相处》,彭萍萍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第153页。

^③ 王明进:《英国两大政党在欧洲问题上的纷争》,载《人民论坛》,2018年6月(中),第31页。

使得卡梅伦和梅两位首相先后下台(再加上撒切尔夫人,保守党已有三位首相因欧洲问题下台),而且,自2016年脱欧公投至2019年6月的三年间,由于反对政府的脱欧政策,已先后有包括内阁成员在内的二十多位保守党议员辞职,其中甚至不乏脱欧大臣和外交大臣等重要成员。2019年7月23日,约翰逊刚刚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但由于他的“硬脱欧”立场,有十多名保守党官员立刻宣布辞职,其中包括财政大臣哈蒙德。可以预料,无论最终是否采取“无协议脱欧”,约翰逊都很难统一党内意见,弥合党内分歧。这不仅削弱了领导人的掌控能力,更削弱了保守党的影响力。毕竟,一个无法就重大问题达成一致、内部摩擦严重的政党很容易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更不用说,还有一些保守党党员已经加入了其他政党(未来还可能更多),就更加重了政党分化重组的可能性。

(二) 根源:保守党内的意识形态分歧

保守党当前在欧洲问题上面临的分歧甚至是分裂,源于其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特别是其政治理念与经济理念之间的矛盾。

保守党脱胎于“托利党”,早期在议会中支持国王,代表的是王权、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概括来讲,英国保守党的政治理念基础是保守主义,主张维系传统,通过渐进改革实现变化,即“为了保存而变革”。英国式的传统保守主义有如下特点: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和财产;尊重权威和秩序,但反对一切权威性质的独断专行;厌恶变化,强调宗教和礼仪的重要性;主张由一个在法律之下的政府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接受代议制政府;主张渐进变化,要求在社会必须变化的时刻,也要尽可能保持民族的整体性。^① 尽管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演变,保守主义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其基本内核保持不变。

在政治—社会理念层面,保守主义倾向于保守和传统,强调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抵制任何威胁“不列颠特性”的变化;主张大社会而不是大政府,相信社会机构自身可以实现有机和渐进的发展,而无须过多国家干预;希望保留传统,维系植根于传统家庭的“道德”观念。^② 但它在经济理念方面又追求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这一点甚至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支持自由贸易,特别是北方的新兴产业阶层希望借此挑战传统的旧贵族。但是,保守主义在政治理念上的保守和坚守传统与经济理念上的自由主义是相悖的,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领域的非自

^① 陈晓律:《英国式保守主义的内涵及其现代解释》,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81-82页。

^② Juuso Järvineniemi, “The EU Question Hits British Parties in an Ideologically Sore Spot,” March 11, 2019, <https://www.thenewfederalist.eu/the-eu-question-hits-british-parties-in-an-ideologically-sore-spot>, last accessed on 9 July 2019.

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 and social illiberal)”是保守主义不可调和的两个方面。^①也有人称之为“英国保守主义内在的一种紧张,即追求市场理性主义(market rationalism)与浪漫的民族主义本能(instinct for romantic nationalism)之间的冲突”。^②

也正因为这二者之间天然存在的内在矛盾,导致保守党内部分成了两个派别:一派更支持自由市场,另一派则更强调国家主权。在欧洲一体化建设早期,保守党之所以持观望态度,主要原因在于党内崇尚主权和强调帝国作用的派别占了上风。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保守党之所以改变态度,申请加入欧共体,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看到了英帝国的衰落,以及欧共体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英国带来的利益,因此“将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是英帝国的替代物”。^③加入欧共体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保守党对参与一体化建设的态度总体上比较积极,原因在于,当时欧共体的经济成分大于政治因素,对国家主权的威胁比现在小得多,因此保守党内部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并未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欧洲一体化建设中政治因素的增多,特别是欧盟的成立,一体化理念与保守党右翼对国家主权的强调产生了越来越剧烈的冲突;进入21世纪后,欧盟一方面遇到了多重危机,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更大程度的一体化深化解解决这些危机,从而引发了保守党内坚持传统主义派别的强烈反感和抵制,认为只有脱欧才是通过保留国家主权和限制移民、从而坚守“英国特性”的途径。^④但对于保守党内支持自由市场的派别而言,离开单一市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其逻辑必然是支持自由市场,当然也包括欧洲层面的单一市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似乎无解。

19世纪,保守党曾由于对《谷物法》的看法不一产生了分裂,尽管与当今保守党面临的问题不同,但其原因几无二致,都是由于国家主权/国家传统与自由贸易这两种意识形态理念相互冲突导致的结果。撒切尔夫人的欧洲立场也是上述冲突导致的结果:其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派别支持自由市场与个人自由,因此她本人积极支持欧洲单一市场的建设;但她又是国家主权的坚决捍卫者,国家主权与欧盟关于“更紧密的联盟”这一目标却不相容,从而导致了撒切尔欧洲政策的自相矛盾。

简言之,当前保守党在脱欧问题上的矛盾源于其内部固有的意识形态冲突,即持

① Victoria N. Bateman, “The Two Irreconcilable Faces of Conservatism: the Economic Liberal and the Social Illiberal,” September 4, 2017, <https://ukandeu.ac.uk/the-two-irreconcilable-faces-of-conservatism-the-economically-liberal-and-the-socially-illiberal/>, last accessed on 11 July 2019.

② Paul Webb and Sarah Childs, “Wets and Dries Resurgent? Intra-party Alignments among Contemporary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64, No.3, 2011, p.391.

③ 赵怀普:《英国与欧洲一体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页。

④ Philip Lynch and Richard Whitaker, “All Brexiteers Now? Brexit, the Conservatives and Party Change,” *British Politics*, Vol.13, No.1, 2018, p.37.

自由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理念的成员之间的分歧。这一分歧可以追溯到撒切尔时期发生的意识形态转型,^①并在脱欧公投后达到顶峰。而国家主权与超国家主义之间的矛盾,亦即硬脱欧派和软脱欧派(包括公投前的亲欧派)争论的焦点,说到底,仍然是国家主权/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自由贸易之间的矛盾。在当前的背景下,保守党面临的问题是,既想要保持上百年的传统,不让渡主权,又想要与欧洲大陆国家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而这两者相互排斥。鉴于英国首相约翰逊目前在脱欧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未来保守党的政策很有可能进一步右转,即进一步向传统右翼保守主义的方向发展。若真如此,保守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这一根本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那么,在保守党内部,与欧洲的关系就将是一个永远横亘在传统保守派和自由贸易派之间的问题。而且,随着脱欧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特别是如果脱欧后英国经济陷入困境,这二者之间的“鸿沟”也许会越来越深。无论约翰逊能否领导英国在2019年10月31日如期脱欧,也无论是否有协议脱欧,保守党对于欧洲问题的分歧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弥合。

二 工党:意识形态分歧与激进化

(一) 现象:工党内部在脱欧问题上的争端

脱欧不仅造成了执政党保守党的困扰和分裂,最大反对党工党同样由于脱欧问题而面临严重的分歧和争端。与此同时,在科尔宾的领导下,工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向激进化甚至有可能向极端化方向发展的迹象。

由于最初将欧洲经济共同体视作“资本主义俱乐部”,^②因此,工党(特别是工党左翼)早期总体上反对欧洲一体化。例如,它早期的经济战略中就包含退出欧共体这一内容。但是,工党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也并非高度团结,从一开始就有部分成员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1981年,包括欧共体委员会前主席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在内的4名工党成员退出工党,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工党领袖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要求英国退出欧共体。这次分裂使工党遭受了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打击。但工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转变立场,特别是布莱尔担任领袖以后,工党一直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加欧洲一体化建设,甚至一度还有加入欧元区的动议。然而在布朗下台之后,工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又有所改变,随着科尔宾2015

^① Richard Hayton, “British Conservatism after the Vote for Brexit: The Ideology Legacy of David Camer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0 (1), 2018, p.230.

^② 石峰可:《英国首次“入欧”前后工党的欧洲一体化政策探析》,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45页。

年当选为领袖,如同保守党一样,欧洲也成为工党内部的一个“问题”,工党甚至再次面临类似1981年的分裂风险。

总体上看,工党成员特别是议员绝大多数是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实用主义者,^①但也有少数议员对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在公投中支持英国脱欧。更重要的是,工党领袖科尔宾的立场一直不明确。科尔宾在当选领袖之前一贯反对欧洲一体化,或者至少对一体化持怀疑态度。他并不反对脱欧公投,也未明确反对英国脱欧。在当选领袖之后,为了平息党内两派力量之间的矛盾,科尔宾采取了一种所谓“建设性含糊”(constructive ambiguity)政策,^②试图“两面讨好”,其结果却招致了绝大多数工党成员的不满,特别是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议员。为此,以“未能在公投中正确引导民众支持英国留在欧盟”为由,脱欧公投结束后,有将近2/3的工党影子内阁成员辞职。2016年6月28日,工党议员以172:40的比例通过了针对科尔宾的不信任投票,尽管该结果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工党的内部分裂显露无遗。以布莱尔和布朗为代表的工党上层成员尤其不满科尔宾的欧洲政策。但科尔宾在中下层普通成员中拥有很高的支持率,并在2016年的工党领袖选举中再次当选。

科尔宾当选领袖后从未对脱欧问题给出明确立场。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工党成员不断向科尔宾施加压力,如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艾米丽·桑贝里(Emily Thornberry)曾在2019年4月3日写给工党议员的一封信中指出,除非工党与保守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中包含关于第二次公投的内容,否则科尔宾就不应与其达成任何协议。但是,仍有部分工党议员强烈反对第二次公投,如工党主席伊恩·拉弗里(Ian Lavery)就表达了此种意见,认为这可能会被英国选民视为对第一次公投结果的背叛。^③此外,工党的一些传统右翼成员则考虑支持保守党政府与欧盟达成的协议。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犹疑和摇摆之后,科尔宾终于表态支持第二次公投。他虽然声明“不排除”推动“留欧”,^④但并未明确表示反对英国脱欧,而且提出,如果工党能够在就脱欧协议达成一致之前赢得大选,则将继续与欧盟举行脱欧谈判。^⑤可见,科尔宾在脱欧问题上的表

^① Andrew Harrop, “Labour’s Brexit Dilemma,” December 2017,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https://library.fes.de/pdf-files/id/13998.pdf>, last accessed on 21 June 2019.

^② Leon Neal and Getty Images, “Leader: What Does Labour Want?” *New Statesman*, July 3, 2019,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brexit/2019/07/leader-what-does-labour-want>, last accessed on 17 July 2019.

^③ Paul Mason, “Britain’s Impossible Futures,” February 2019, <https://mondediplo.com/2019/02/01/brexit>, last accessed on 23 June 2019.

^④ 陈立希:《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要求就“脱欧”方案二次公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7/11/c_1210189051.htm, 2019年8月4日访问。

^⑤ Gaby Hinsliff, “Labour Is Finally Backing a Second Referendum. Is It Too Little, Too Late?” July 9,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9/jul/09/labour-second-referendum-jeremy-corybn-brexit>, last accessed on 11 July 2019.

态仍然不够明确,因此也无法解决党内分歧。

这种分歧充分体现在议会就脱欧问题举行的历次投票过程之中。仅举其中几个例子:在就是否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的表决中,尽管工党要求本党议员投赞成票,但仍有 52 名工党议员投了反对票,其中包括 3 名本应负责政党纪律的党鞭,以及其他 11 名影子部长。此外,还有 4 名影子内阁成员辞职,没有参加投票。再如,在 2019 年 1 月 29 日关于重新谈判脱欧协议的表决中,有 7 名工党议员投票支持保守党政府。在关于推迟脱欧时间的投票中,有 14 名工党议员违反了工党的纪律,投了赞成票。

由于不满工党的脱欧立场,已经有 8 名工党议员脱离工党,加入了新成立的跨党派联盟“独立团体”(Independent Group)。这些成员的立场更接近于中间派,与科尔宾更倾向于左翼的主张不尽一致。如果科尔宾继续采取目前的这种立场,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工党成员退党。

(二) 根源:意识形态的分歧与激进化

与保守党类似,工党在脱欧过程中的争端一方面凸显了其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理念方面的分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科尔宾的领导下,工党还有可能向更激进化甚至极端化方向发展。

英国工党起源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工人运动,其早期的群众基础为工人阶级与中下层民众,“民主社会主义”为其最初的理念基础。但“工党历史上是最复杂的政治行为体,有众多派别和分支,且内部权力结构划分成不同的支柱”,^①虽经过多年整合,但其内部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左、中、右”三派的分野。^②大体来说,左翼倾向于实行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政策;右翼倾向于放弃工党固有的国有化政策,接纳新自由主义;中左翼则主张实行“混合经济”政策,走中间道路。几十年来,工党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从未彻底消除,其欧洲一体化思想也深受影响。

左右翼交替主导是工党发展历程的特点。在野时期的工党出于反思政纲、准备大选的需要,左右翼的思想交锋更加激烈。^③20 世纪 50 年代,工党越来越向“右”的方向发展,其理念也更接近保守党,这一时期两党实现了“共识政治”。20 世纪 70 年代

^① Joseph Fox, “How the Party-political System Could Distintegrate after Brexit?” September 19, 2018,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uk/entry/the-party-political-system-will-disintegrate-after_uk_5b9fd16ce4b086ac5a9e0868?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IfaH2NWbRKGy8DtUke26ahIwli88T6YChAmErwsa6hJzn0n7cByz-Mg8aRdNifZ55SW7kswOGx3ePdwX8Jk07JKASRDT_HV2WrPN1L_iSW3aNwuwfjOsrScwnBEPit7T7xUUmiTODI2-HeGCgimZpqSm8eeUJu1zNtm_1r3hvPh, last accessed on 12 July 2019.

^② Monica Poletti, Tim Bale and Paul Webb, “Explaining the Pro-Corbyn Surge in Labour’s Membership,” November 16, 2016, <http://eprints.lse.ac.uk/71937/1/blogs.lse.ac.uk-Explaining20%the20%pro-Corbyn20%surge20%in20%labour20%member.pdf>,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19.

^③ 吴韵曦:《从“科尔宾现象”看英国工党的变革与面临的挑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 年第 2 期,第 140 页。

末期 80 年代初期,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重新走向激进化,致使党内分裂。受到这段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在 1987 年以前,工党对欧洲一体化总体上持怀疑甚至是反对态度。^①例如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工党在 1974 年的竞选纲领中公开指出,希思政府加入共同市场是一个“深刻的政治错误”。^②工党在 1987 年和 1992 年的竞选纲领中也只是笼统地提出要加强英国在欧共体中的作用。直到 1994 年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实行“第三条道路”,向中间路线靠拢,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撒切尔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工党才开始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建设,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在欧盟发挥领导作用。^③但工党内部对“第三条道路”始终存在争议,有人批评它不过是保守党纲领的翻版,特别是亲近企业、疏远工会、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导致工党远离了其最初的群众基础,^④因此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2010 年工党在大选中失败后,接任领袖的米利班德提出以回归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的“蓝色工党”理念,突出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缩小贫富差距,维护工薪阶层和低收入选民的利益等主张,并“猛烈攻击保守党的亲富人政策,试图重回社会民主主义传统”。^⑤他还在 2011 年的工党年会上宣称:“新工党的时代已经过去,新一代已经接手……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观念,从事政治的不同方式。”^⑥他的改革不但没有收到实质性效果,没有树立一种明确的核心理念,反而加剧了工党内部支持中间路线和支持传统理念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分歧。

2015 年 9 月,科尔宾以 60% 的得票率当选工党领袖,并于次年 9 月以 62% 的得票率再次当选,却在工党内部引起了极大争议,原因在于他的政治理念较为激进。科尔宾出身于草根阶层,在当选领袖之前一直是工党的后座议员,相较于以布莱尔和布朗等为代表的中间派,其意识形态更加“左倾”,也更加激进。他的主要政治理念包括:反对君主立宪制,甚至反对资本主义本身;反对伊拉克战争、主张销毁核武器、退出北约;欢迎欧洲难民;在经济政策上,他反对紧缩,主张扩大公共开支,并强烈主张实行国有化。但事实上,科尔宾的很多政策主张并非“原创”。工党创始人科尔·哈代(Keire Hardie)对该党的定位就是一个代表工人的“抗议党”,科尔宾在很多方面都与哈代的

^① Rob Manwaring and Evan Smith, “Corbyn, British Labour and Policy Change,” *British Politics*, 2019, p.11, <https://doi.org/10.1057/s41293-019-00112-9>, last accessed on 12 June 2019.

^② “February 1974 Labour Party Manifesto,” February 1974, <http://www.labour-party.org.uk/manifestos/1974-feb/1974-feb-labour-manifesto.shtml>, last accessed on 30 July 2019.

^③ “New Labour Because Britain Deserves Better,” <http://labourmanifesto.com/1997/1997-labour-manifesto.shtml>, last accessed on 30 July 2019.

^④ 李靖堃:《脱欧公投视角下的英国民主政治困境》,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4期,第91页。

^⑤ 叶国玲:《英国政党政治新变化背后的思潮和理念因素》,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4期,第4页。

^⑥ Patrick Diamond, “The Progressive Dilemmas of British Social Democracy: Political Economy after New Labou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5, 2013, p.89.

意识形态和侧重点相同,如支持女性权利以及激进的平等主张等,而他的国有化主张则类似于工党 20 世纪 60 年代的政策。

外界对科尔宾的评价不一,有人认为他的理念代表着工党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回归”,也有人认为他是民粹主义者。如《哲学家杂志》主编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在《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科尔宾的政治是“最纯粹意义”上的民粹主义;^①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则认为,^②尽管科尔宾与特朗普不同,但同样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民粹主义者。要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复杂,特别是需要界定民粹主义这一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的概念,且不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不在此处赘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出于选举的需要,在 2017 年的竞选纲领中,^③科尔宾的立场已有所软化,尽管他仍然提出了医疗服务部门和铁路以及邮政部门重新国有化(“所有权的替代模式”, Alternative models of ownerships)、扩大民主、向地方和社区下放更大权力、取消大学学费、提高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税等主张,但对于其他一些问题,其立场已经不再那么激进。而且,工党在大选中提出的口号是“为大多数人服务”(for the many not the few),显然是要争取不同阶层选民的支持,而不仅仅是面向中下层民众。因此,尽管从科尔宾的政策主张中可以看到,与布莱尔和布朗时期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相比,科尔宾的确在逐渐远离中间路线,向更激进化的方向发展,但至少目前还达不到“极端化”的程度,更不能武断地将其划归为“民粹主义”的行列。特别是如果与工党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政策主张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他在很多方面更像是在向传统意识形态回归。另外,科尔宾也并非民族主义者,与米利班德提出的控制移民数量的主张不同,他并不反对移民,而是认为很多问题是就业市场的问题,不能让移民来做“替罪羊”。另外,他也并不排外,相反,2017 年的竞选纲领中体现了工党左翼传统的国际主义思想。

但迄今为止,科尔宾的政治理念尚未最终成型,仍在修订和发展过程中,他不仅没有提出成系统且具有理论支撑的政治理念,而且不存在重回执政地位所需的清晰的“路线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科尔宾的领导下,工党仍在经历后布莱尔时期

^① Julian Baggini, “Jeremy Corbyn is a Great Populist. But That’s No Good for Our Democracy,” July 25,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jul/25/jeremy-corbyn-populist-democracy-mps>, last accessed on 11 June 2019.

^② John Gray, “Jeremy Corbyn and the Politics of Catastrophe,” September 22, 2015, <https://www.newstaterman.com/politics/uk/2015/09/jeremy-corbyn-and-politics-catastrophe>, last accessed on 11 June 2019.

^③ “The Labour Party Manifesto 2017: For the Many Not the Few,” <https://labour.org.uk/wp-content/uploads/2017/10/Labour-manifesto-2017.pdf>, last accessed on 17 July 2019.

以来的意识形态重塑和路线方针定位。^①这也是导致科尔宾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立场含糊和前后不一致的重要原因。

科尔宾的主张赢得了工党大量普通党员的支持,工党队伍也得到了壮大。在他2015年9月当选工党领袖后不久,就有1.5万人加入工党;而在脱欧公投之后的两周内,有12.8万人加入工党。2015年5月到2016年7月,工党党员从19万激增到51.5万,到2017年年底达到57万。^②其支持者主要包括:一部分曾对工党失去信心的年轻人;曾经离开工党或者是对“新工党”感到不满的原有支持者;另外还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工党上层精英仍然对科尔宾的主张不满,因为他们与科尔宾的意识形态立场具有本质的差异。由此,工党精英成员与基层党员之间的分歧也愈益暴露在民众面前,工党内部分歧的公开化,尤其是在整个脱欧过程中立场的不确定和不一致,无疑不利于其在民众面前重塑形象。

三 “第三党”力量普遍上升

在现有的选举制度框架下,保守党和工党(1900年以前是保守党和自由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即所谓“第三党”)在英国发挥的政治影响十分有限,很难左右政府的政策,更不用说对两大主要政党的地位构成实质性威胁,但“脱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第三党”的生存状况,不仅支持率明显呈现上升趋势,而且越来越多地具备了冲击两个主要政党的潜力。而且,除“历史悠久”的自由民主党以外,英国独立党/脱欧党,以及以苏格兰民族党为代表的地方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甚至绿党,近年来的影响力都有所增强。特别是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与此同时,由来自左右翼的成员共同组成的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新政党“独立团体”也有可能推动政党的分化重组。

(一) “第三党”冲击原有政党格局的能力上升

从2010年^③到2019年的短短十年间,英国先后举行了三次大选,分别为2010年、2015年和2017年,并于2014年和2019年各举行了一次欧洲议会选举。这几次选举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① 夏添:《英国政党政治形势》,载王展鹏主编:《英国发展报告(2017-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页。

^② Luke Martell, “Corbyn, Populism and Power,” *Hard Times*, <https://hard-times-magazine.org/index.php/Hardtimes/article/download/4/1>, last accessed on 17 July 2019.

^③ 尽管卡梅伦发表“脱欧”公投演说是在2013年,但在此之前保守党内部已经不断有退出欧盟的相关呼吁,英国的政党政治格局也是从2010年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本部分将2010年作为起始年代。

表 1 2010-2017 年英国议会选举结果

	保守党		工党		自民党		民主统一党		苏格兰民族党		新芬党		威尔士民族党		绿党		英国独立党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2010年	36.1	307	29.0	258	23.0	57	0.6	8	1.7	6	0.6	5	0.6	3	1.0	1	3.1	0
2015年	36.9	331	30.4	232	7.9	8	0.6	8	4.7	56	0.6	4	0.6	3	3.8	1	12.6	1
2017年	42.4	318	40.0	262	7.4	12	0.9	10	3.0	35	0.7	7	0.5	4	1.6	1	1.8	0

资料来源:BBC, <https://www.news.bbc.co.uk/2/shared/election2010/results>; <https://www.bbc.com/news/election/2015/results>; <https://www.bbc.com/news/election/2017/results>, 2019年7月17日访问。

表 2 2014 年和 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

	英国独立党		脱欧党		工党		保守党		自民党		民主统一党		苏格兰民族党		新芬党		威尔士民族党		绿党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得票率	议席数
2014年	27.5	24	/	/	25.4	20	23.9	19	6.9	1	0.8	1	2.5	2	1.0	1	0.7	1	7.9	3
2019年	3.4	0	31.6	29	14.1	10	9.1	4	20.3	16	0.7	1	3.6	3	0.7	1	0.3	1	12.1	7

资料来源:BBC, <https://www.bbc.com/news/events/vote2014/eu-uk-results>;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48403131>, 2019年7月17日访问。

上述三次全国性议会选举的结果每一次都不相同:2010年,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而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一举获得57个议席,成为决定政局走向的关键角色。它与保守党组成了二战后英国的第一个联合政府。2015年,保守党出人意料地获得多数议席,组成了单一政党政府。然而在2017年举行的提前大选中,再一次出现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获得超过半数议席的情况,保守党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政治支持”下组成少数派政府。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在这一次选举中,保守党和工党的得票率加起来超过了80%,这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非常少见,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两党制的回归。但一方面鉴于得票率并未转化为议席数,另一方面由于此次大选是在脱欧这一特定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尚无法得出肯定性结论。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英国的政党政治格局正处在调整和不稳定状态。

由于英国采用简单多数投票制,因此政党的得票率与议席数并不成比例。但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则采用比例代表制,且欧洲议会选举不会影响国内政局,因此上述三次全国性议会选举或许更能体现选民的意愿。在2014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一举成为最大政党,这也是除保守党和工党以外的第三党获得的最多议席。而在2019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保守党和工党的败绩更加明显。其中保守党仅获得4个议席,沦落为第五名;而工党也仅获得10个议席。脱欧党和自由民主党由于自始至终都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脱欧的立场,因此受到选民的欢迎。

根据上述几次选举的结果,可以发现,已有多个政党具有了影响英国政局或者至少是某些政策的能力,主要包括自由民主党、英国独立党,以及以苏格兰民族党为代表的地方民族主义政党。

自由民主党成立于1988年,由原来的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尽管多年来一直是英国的第三大政党,也曾经作为“小伙伴”进入过政府,但总体上在英国政坛发挥的作用有限。特别是它在2015年的选举中仅获得8个议席,从第三大党下跌为第四大党(落后于苏格兰民族党)。但脱欧给了自由民主党“东山再起”的机会。脱欧公投之后,自由民主党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脱欧,要求第二次公投,并在2019年提出了“让脱欧见鬼吧”(Bollocks to Brexit)这一口号,出乎意料地赢得了选民的支持,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了超过20%的支持率,仅次于脱欧党。而在欧洲议会选举一周后进行的民调显示,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超过了脱欧党,位居第一(24%),脱欧党的支持率为22%,保守党和工党均为19%。^①这说明在保守党脱欧方案陷入僵局、工党立场

^① Jamie Ross, "This Is the Anti-Brexit Party That Came down from Nowhere to Top Polls in Britain," May 31, 2019,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liberal-democrats-the-anti-brexit-party-which-came-from-nowhere-to-top-polls-in-britain>, last accessed on 21 June 2019.

暧昧的情况下,立场鲜明的政党更容易得到选民的支持。

英国独立党成立于1993年,其唯一宗旨就是推动英国退出欧盟。如前所述,它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24个议席,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英国独立党的快速崛起正是推动保守党举行脱欧公投的原因之一。在2015年的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1个议席,首次进入议会,并获得了高达12.6%的选票,只是由于英国的“简单多数”选举制度才使其没能获得更多议席。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于2016年7月辞职,并于2019年2月成立脱欧党,其宗旨仍然是致力于英国脱欧。在短短3个月之后,脱欧党就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31%的选票、29个议席,取代英国独立党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如果保守党和工党未来仍然无法在脱欧问题上取得突破,那么它的支持率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近年来,地方民族主义政党在英国政治中的“可见度”也与日俱增,其中苏格兰民族党的影响最大,脱欧进一步为这些政党提供了独立或获得更大权力的契机。苏格兰民族党曾在2014年推动过一次独立公投,但未能成功。然而,英国公投脱欧再次成为苏格兰民族党推动独立的理由,因为苏格兰有60%以上的选民在公投中支持留欧。尽管其独立诉求导致它在2017年大选中失去了21个议席,但它仍然是苏格兰的第一大党。目前,它虽然暂时搁置了推动独立的动议,但如果英国最终采用“无协议脱欧”,其再次寻求独立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威尔士民族党也在脱欧公投后提出了独立诉求,尽管其独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却有可能成为搅动政局的不安定因素;在北爱尔兰,新芬党借由脱欧这一公投结果重新提出与爱尔兰统一的诉求,而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在2017年选举中成为执政党保守党的“政治伙伴”,并以此获得了与其本身实力不相称的影响。

(二) 新兴政党以及跨党派联盟的成立或对固有政治格局产生挑战

在脱欧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兴政党势力和跨党派联盟,或许会对现有政治格局产生挑战。

2019年2月,8名工党成员和3名保守党成员由于不满各自政党的脱欧政策而退出原来的政党,随后宣布成立“独立团体”(The Independent Group)。该团体反对脱欧,支持欧洲一体化,呼吁进行第二次公投,在意识形态方面持中间路线。4月,它改称“改变英国——独立团体”(Change UK—The Independent Group),并正式注册为政党,而且参加了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但仅获得3.3%的选票,没有获得议席。随后,有6名成员退出了该党,其中4名组成了议会下院的“独立派”(The Independents)团体。6月,该党又重新更名为“独立团体”,共有5名议员。尽管与下院总共650名

议员相比,其数量微不足道,且该政党仍处于不断磨合和重组的过程,但它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既是作为对工党和保守党不满的一种表达,也有可能作为一个坚持中间路线的政治组织,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从而导致英国政党的分化重组,特别是在当前保守党和工党都有向激进化方向发展、中间政党缺失的情况下,“独立团体”有可能成为一匹“黑马”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

自由民主党对“独立团体”的成立表示欢迎,其领袖温斯·凯博(Vince Cable)曾多次表示希望与其合作,认为二者有很多相同的理念。自由民主党前领袖蒂姆·法伦(Tim Farron)甚至认为这两个政党“完全有可能”合并成为一个新的中间派政党。^①在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后,温斯·凯博还曾表示欢迎独立团体成员加入该党。^②因此,尽管独立团体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前拒绝了与自由民主党组成竞选联盟的提议,但双方未来开展进一步合作甚至组成同一个政党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另外,在脱欧公投之后,跨党联盟这种新的竞选形式正在英国出现。2016年7月,多位企业家、学者和政治家共同成立了跨党竞选联盟“更加团结”(More United)。该联盟声称,其价值观包括机遇、宽容、民主、环境与开放(欢迎移民、与欧洲保持密切关系等),只要候选人认同这些价值观,该联盟就将对其进行资助。它在2017年大选中资助的候选人分别来自工党、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有学者认为,十年前,在同一个竞选团体中支持来自不同政党的候选人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表明了今天的政治体制正在发生变化。^③与此类似,“脱欧意味着脱欧”(Leave Means Leave)则是一个支持硬脱欧的团体,其成员同样来自不同的政党,包括英国独立党前领袖法拉奇、约翰·莱德伍德(John Redwood)等保守党党员以及凯尔文·霍普金斯(Kelvin Hopkins)等工党党员。虽然它们都只是竞选联盟,但也不排除未来成立新政党的可能性。

无论是“独立团体”作为一个新兴政党的成立,还是上述跨党派竞选联盟的出现,如果继续发展壮大,很有可能吸引更多成员加入,从而产生政党力量的分化重组,并对英国政党体制的走向产生影响。

^① Samantha King, “Tim Farron: Forming Centrist Party with Independent Group ‘Entirely Possible’,” February 21, 2019, <https://talkradio.co.uk/news/tim-farron-forming-centrist-party-independent-group-entirely-possible>, last accessed on 19 July 2019.

^② Jessica Elgot, “Remain Forces Pact Would Have Helped Lib Dems Beat Brexit Party, Says Cable,” May 27,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9/may/27/remain-forces-pact-would-have-helped-lib-dems-beat-brexit-party-says-cable>, last accessed on 20 July 2019.

^③ Joseph Fox, “How the Party-political System Could Distintegrate after Brexit?” September 19, 2018,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uk/entry/the-party-political-system-will-disintegrate-after_uk_5b9fd16ce4b086ac5a9e0868?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lfaH2NWbRKGy8DtUke26ahlwli88T6YChAmErwsa6hJzn0n7cByz-Mg8aRdNifZ55SW7kswOCx3ePdwX8Jxk07JKASRDT_HV2WrPNIL_iSW3aNwuwfjOsrScwnBEPit7T7xUUmT0DI2-HeGCgimZpqSm8eeUJu1zNtm_1r3hvPh, last accessed on 12 July 2019.

四 英国政党体制的演变及其原因

随着脱欧造成保守党和工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增大,以及各自政策立场的“激进化”趋势,再加上第三党力量的增强,英国的政党体制也在发生变化。本部分借助意大利政治学家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政党体制理论,分析和比较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及其原因,尤其是脱欧对其造成的影响。

(一) 乔瓦尼·萨托利的政党体制理论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学界,向来重视对政党体制的研究,如何对政党体制分类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学者一般将世界上的政党体制划分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①在欧洲国家中,英国被认为是典型的实行两党制的国家,而其他欧洲国家则绝大多数实行多党制。在西方学界,乔瓦尼·萨托利关于政党体制的分类^②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③他提出的划分政党体制的两个最重要的参照指标是“相关政党”(relevant parties)的数量和意识形态/政策立场。首先,“政党的数目直接表明——尽管是大体上——一个政治体制的重要特色:政治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碎片化的或统一的,分散的或集中的”。^④因此,政党的数量是界定政党体制不可或缺的指标,但这一指标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合法政党的数量。为此,萨托利提出了“相关政党”这一概念,并制定了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具有“相关性”的标准。他认为,需要依据一个政党在议会(主要是下院)中获得的议席比例(而不是得票率)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选举实力”(electoral strength),但他并不同意简单地设置一个比例门槛,因为政党的议席比例与其是否具有“相关性”不一定成正比。^⑤比这一比例标准更重要的是,要看一个政党是否具有“执政潜力”(governing potential)或“组阁潜力”(coalition potential),或者是否具有“讹诈的潜力”(blackmail potential,即是否有能力影响政府的政策):“只要它的存在或出现影响到政党竞争的战术,特别是当它改变了定位于执政的政党的竞争方向——通过决定从向心的到离心的转变,不论是左向,还是右向,或在两个方向,那么,

① 详见杨祖功、顾俊礼等:《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173页。

② 《政党与政党体制》一书于1976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并已译成中文出版。本文既参考了其英文版本,一些译法也参考了中译本。英文版本为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CPR Press, 2005; 中译本为[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③ 另一个被经常用于评估政党体制碎片化的理论是“有效政党数量”(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20世纪70年代末由马尔库·拉克索(Markku Laakso)和莱恩·塔克佩拉(Rein Taagepera)创设。

④ [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169页。

⑤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107.

它就具有了相关性。”^①第二个参照指标是不同政党政策立场/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左右翼政党之间的政策立场和意识形态分歧程度,因为这一点决定着一个国家政党体制的性质。随着意识形态分歧程度的改变,政党体制会随之发生变化,或者会出现新的第三党。^②

以上述指标为基础,萨托利将政党体制划分为七种,^③它们又可被归纳为非竞争性和竞争性政党两大类。^④而竞争性政党体制(欧洲国家均属于该体制)又可划分为两党制、主导党体制和多党制。两党制是指两个主要政党轮流执政,两党之间的竞争具有向心性,即都是为了争取选民而向中间靠拢,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很小,且第三党没有能力阻止两大主要政党执政。主导党体制(predominant-party system)是指尽管存在其他小党,但同一个政党总是能够赢得议席多数。而多党制则比较复杂,又可划分为温和多党制(moderate/limited multipartism,碎片化程度较低,通常有3-5个相关政党,政党的意识形态差距较小,政党交替组成联盟联合执政)、极化多党制(polarised/extreme multipartism,政党之间意识形态差距较大,碎片化程度较高,相关政党数量一般超过5个,存在反体制政党)和碎片化多党制(segmented multipartism,相关政党数量较多,一般超过10个,碎片化程度高于温和多党制)。当然,无论哪种多党体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都是“相关”政党的数量超过两个,这也是它区别于一党制或两党制的重要特征。

(二)英国政党体制的发展演变

英国自从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由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保守党和工党在英国政坛占据垄断地位,二者轮流执政,其他小党都不足以成为萨托利所界定的“相关政党”,而且,在此期间,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不断趋同,因此被称为两党的第一次“共识政治”时期。换言之,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十分典型的两党制。

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保守党和工党的意识形态都出现了向激进化甚至极端化发展的趋势。工党意识形态进一步左转,提出了增加公共支出、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单边核裁军等比较激进的主张。而保守党则进一步右转,特别是在撒切尔任首相之后,采取了诸如限制工会力量、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公共开支等政策。在这种情

① [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171-174页。

②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110.

③ Ibid.

④ [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185-297页。

况下,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拉大,也因此给了自由党及其继任者自由民主党以机会:1974-1992年,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在大选中的平均得票率为19.5%(1950-1970年,自由党的平均得票率只有6.8%,其支持者主要是中间选民)。尽管这一比例是得票率而非下院议席比例,但足以影响英国政局。例如,1974年2月的大选出现了保守党和工党所获议席均未超过半数的情况,并导致英国在当年10月再次举行大选,这也是英国1910年以来出现的唯一一次同一年举行两次大选的情况。因此,可以认为,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已经构成了萨托利所称的“相关政党”,尽管它还没有对两党制构成实质性威胁,但英国严格意义上的两党制已经受到一定的影响。

工党与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极化趋势于20世纪90年代结束,两党再次向趋同化方向发展。1992年保守党第四次连任,工党随后开始了“现代化”道路,放弃了“左倾”立场。这一进程自布莱尔1994年任领袖后开始加速。他将工党重新定位为“新工党”,实行中间偏左的“第三条道路”,实施国家宏观调控的混合经济以及“积极的”福利政策。而同一时期,保守党也逐渐放弃了撒切尔的立场,开始采用走中间道路的竞选纲领,特别是在2001年和2005年大选之前。直到2010年保守党重新上台,两党基本上都保持了这种中间策略。因此,这段时期被称为第二次“共识政治”,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别也是1955年以来最小的。但与此同时,两个主要政党的支持率呈下降趋势,2010年两党得票率之和仅为65%(议席数占的比例要高一些)。自由民主党在这段时期对两个主要政党形成了持续冲击,其议席数也在1997-2005年的三次选举中均突破了5%这一门槛。^①除此之外,原本的一些边缘性小党的支持率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一些极端政党的支持率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例如,1997年,“疑欧公投党”赢得了2.6%的选票;2005年,以反对伊拉克战争为宗旨的极左翼政党“Respect”获得了1个议席;2010年,英国独立党获得了3.1%的选票,极右翼英国民族党(BNP)获得了1.9%的选票。

参照萨托利对政党体制的分类,可以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英国的政党体制并不完全符合两党制的定义,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多党制的部分特征,特别是在选举层面。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其政党体制更是出现了向“温和多党制”发展的迹象,^②即存在3-5个“相关”政党,但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并不大。由于英国实行简单多数选举制,得票率与议席数并不成比例,因此,仍然只有

^① 1997年,自由民主党获得46个议席,占比近7%;2001年,自由民主党获得52个议席,占比近8%;2005年,自由民主党获得62个议席,所占比例超过9%。

^② Thomas Quinn, “From Two-Partism to Alternating Predominance: The Changing UK Party System, 1950-2010,” *Political Studies*, Vol.61, 2013, p.396.

工党和保守党能够执政。但英国政党政治多元化的出现确定无疑。^①

从20世纪末开始,这种“温和多党制”有向极端化和碎片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自英国进入“脱欧时代”之后,不仅“相关政党”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保守党和工党两个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特别是各自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政策立场)差异又重新拉大,英国的政党体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它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先前时代的特征和轨迹。

(三)脱欧加剧英国政党体制向多元化和碎片化发展

如前所述,进入21世纪后,“脱欧”成为影响英国政治的最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其政党政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首先从“相关政党”的数量来看。2010年后,能够影响英国政府决策的政党数量越来越多,已经超过5个。自由民主党毫无疑问是一个“相关政党”,它不仅具备影响执政党政策的潜力,而且在2010年更是进入政府,具备了影响政府决策的实际能力。英国独立党/脱欧党无疑也是“相关政党”,尽管英国独立党仅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得过1个议席,但得票率超过了12%。如果英国实行比例代表制而不是现在的简单多数制,则其议席数将远远超过5%这一门槛,它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实践中,英国独立党对于推动执政党保守党举行脱欧公投的确施加了很大压力。同样,苏格兰民族党、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以及新芬党等地区性政党都具备了“相关政党”所需的“影响政策或政局”的条件,特别是苏格兰民族党。按照萨托利对“多党制”的最低数量界定,或许可以认为,英国的政党体制存在向多党制发展的可能,而且出现了碎片化加剧的倾向。

除了“相关政党”数量方面的变化,英国主要政党之间以及主要政党内部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差距也在拉大。原因在于,2013年之后,是否脱欧以及如何脱欧几乎成了英国政坛关注的唯一事项,因此显得“冲突”十分集中。如前所述,对于这一问题,不同政党、不同派别之间的对立十分突出。而且,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不同政党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政党内部,且似乎没有调和与趋同的余地,也就是说,几乎不存在向“向心”方向发展的可能。这一点可以从梅与科尔宾及其他政党数次关于脱欧协议的谈判破裂,以及议会三次否决脱欧协议并且否决全部脱欧“备份”方案等事例中得到验证。

综上所述,在当前英国的政党体系中,不仅“相关政党”的数量达到了空前程度,

^① Thomas Quinn, “From Two-Partism to Alternating Predominance: The Changing UK Party System, 1950–2010,” p.390.

而且,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特别是在脱欧问题上几乎不存在向所谓中间路线转移的可能性。无论是梅的“软脱欧”还是科尔宾的“建设性含糊”都不受选民欢迎,反倒是自由民主党和脱欧党旗帜鲜明的立场得到的支持更高,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和之后的几次民调都表明了这一点。新任首相约翰逊始终高调坚持“硬脱欧”,或许会进一步推动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向激进化方向发展。另外,反建制政党脱欧党的影响力仍有可能上升。据此,按照萨拉利的理论,可以认为,英国当前的政党体制不仅具备了多党制的某些要素,而且在向极化的政党体制发展:不仅相关政党数量较多,而且主要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且不易出现向心性。正因为如此,当前英国政党体制的“碎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对英国的两党政治格局造成了实质性影响,即使不会向欧洲大陆模式的多党制发展,但多元化和碎片化的发展方向显露无遗。

(四)政党体制向多元化和碎片化发展的原因

导致英国政党体制向多元化和碎片化趋势发展的原因,除了“脱欧”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件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英国民众自身的意识形态偏好也在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随着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分工的变化,中间阶层的人口数量增加,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层数量减少,民众的意识形态偏好随之产生变化。阶级意识减弱,阶级政治让位于身份政治,相应地,阶级/阶层与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密切。其次,随着全球化的加深,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加剧,导致社会分歧和社会裂痕加大,英国选民也正在经历重组和新的分裂,年龄、就业和教育水平正成为新的分界线。^① 根据民调机构“YouGov”对选民在2017年大选中投票行为的调查发现,^②就年龄而言,在18-19岁的第一次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支持工党的选民比支持保守党的多47%;而在70岁以上的选民中,支持保守党的比例比支持工党的多50%;从就业状况来看,在退休人员中,支持保守党的比例高于工党39%,而在学生中,支持工党的比例高于保守党45%;就教育水平而言,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更倾向于支持保守党(22%),而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选民则更倾向于支持工党(17%)。再次,选民对政党的支持和偏好越来越不稳定,同样的调查

^① Jess Garland and Chris Terry, “The 2017 General Election: Volatile Voting, Random Results,” Electoral Reform Society, August 2017, <https://www.electoral-reform.org.uk/wp-content/uploads/2017/08/2017-uk-General-Election-Report.pdf>, last accessed on 29 July 2019.

^② “How Britain Voted at the 2017 General Election,” June 13, 2017, <https://yougov.co.uk/topics/politics/articles-reports/2017/06/13/how-britain-voted-2017-general-election>, last accessed on 29 July 2019.

表明,2017年大选是1931年以来选民投票偏好变动程度最大的一次,^①只有56%的留欧派和56%的脱欧派在2017年大选中投票支持的政党与2015年相同,而这在地域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保守党在工党的一些传统“堡垒”地区,如东北德比郡(North East Derbyshire)、南特伦河畔斯托克(Stoke-on-Trent South)、曼斯菲尔德(1885年以来从未有保守党候选人当选为议员)赢得了议席;而工党则在一些更富裕的选区,如肯辛顿(Kensington,工党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该选区的议席)和巴特西(Battersea)获得了议席,坎特伯雷1885年以来一直是保守党的票仓,此次也由工党获得。最后,民众对政治精英和主流政党的信任度普遍下降,因而才投票支持反建制政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刚刚成立三个月的脱欧党能够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这更多地也可视为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一种不满和反抗。^②

上述种种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但英国脱欧无疑将这些问题推到了前台,并强化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分歧,使其更加突出。换言之,目前英国面临的困境是,左与右的分野(传统政治分野)、社会阶层的裂痕以及脱欧态度的对立这三者的叠加,造成了今日政党体制向更加分散化和碎片化的方向发展。如果脱欧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这些分歧的长期发酵将对英国政治共识和社会团结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结语:英国政党体制的走向

对于英国政党体制当前的特点与走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争论颇多,学者也“创造”了诸多新的术语予以概括。多数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认为,英国仍然是传统的两党制,但也有人认为英国已经是一种多党制,未来联合执政模式将成为常态。^③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其他多种界定,例如,有人认为,二战以后的英国是一种“两党+”模式(two“plus” party system),^④即两个政党占主导地位,但小党偶尔在选举中发挥关键作用,或者组成联合政府,或者主要政党被迫形成少数派政府。也有人称其为

^① Jess Garland and Chris Terry, “The 2017 General Election: Volatile Voting, Random Results.”

^② Matthew Hall, David Marsh and Emma Vines, “A Changing Democracy: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 the British Political Tradition,” *Policy Studies*, Vol.39, No.4, 2018, p.378.

^③ Patrick Diamond, “The Progressive Dilemmas of British Social Democracy: Political Economy after New Labour,”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5, Issue 1, 2013, p.92.

^④ Patrick Dunleavy, “Facing Up to Multi-Party Politics: How Partisan Dealignment and PR Voting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Britain’s Party Systems,”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58, No.3, 2005, p.2.

“两个半政党制”^①“轮流占优模式”^②(alternating-predominant),即典型的两党制与单一政党占优势地位这两种模式的结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英国当前的政党政治正处于变化过程之中,很难予以确切的界定。

自2010年以来至今的十年间,英国的政党政治更加复杂多变,其中,脱欧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期间不仅出现过1945年以来的第一个联合政府(2010年),也出现过少数派政府(2017年),同时还出现了反建制政党(英国独立党/脱欧党)在连续两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的现象。在此期间,英国的政党政治具有了越来越多的碎片化与多元化(或者说是多党制)特征,不仅所谓“相关政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个,而且,不同政党之间以及两个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内部意识形态差异和政策立场对立也呈扩大趋势。

除了脱欧这一特定背景,导致上述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英国社会阶层内部亦发生种种改变,特别是社会裂痕的拉大、阶级意识的淡化与身份政治的加强,以及对政治精英的不满等种种因素累积起来,造成了今日英国政党政治向着分散化和碎片化方向发展。

但对于英国的政党体制是否已经是“多党制”这一问题,仍需更长时间的观察,而不能草率得出结论。首先,尚无法判断目前的发展究竟是一种长期趋势,还是在脱欧这一特定背景下的特殊情形,因为“脱欧”毕竟是一个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的“非常态”事件。其次,尽管从上文的论述可以认为,英国的确具备了“多党制”的某些要素,特别是在选举层面,两个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的得票率在2017年之前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20世纪50年代的超过90%,到2010年时下降到65.1%(2015年略有上升,为67.2%),而其他政党的得票率则从1979年的19.2%上升到2010年的34.9%。^③但在议会层面差距并没有这么明显:其他政党的议席数仅从1979年的4.2%增加到了2010年的13.2%,^④而且,除2010年自由民主党进入过政府之外,有执政可能的仍然只有保守党和工党。

由此可见,认为英国已经是多党制的论点显然并不成立,最多只能认为英国具备

^① Alan Siaroff, “Two-and-a-Half-Party Systems and the Comparative Role of the ‘Half’,” *Party Politics*, Vol. 9, No.3, 2003.

^② Thomas Quinn, “From Two-partism to Alternating Predominance: The Changing UK Party System, 1950-2010,” p.395.

^③ “UK Election Statistics 1945-2000,”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March 29, 2001, <http://www.parliament.uk/documents/commons/lib/research/rp2001/rp01-037.pdf>, last accessed on 11 July 2019.

^④ “Vote 2011: UK Rejects Alternative Vote,” BBC News, May 7, 2011, <http://www.bbc.co.uk/news/uk-politics-13297573>, last accessed on 29 July 2019.

了多党制的部分因素。换言之,英国的两党制并未从根本上或实质意义上受到动摇,保守党和工党作为两个占统治地位政党的地位在短期内仍无法撼动,也几乎不会出现法国2017年选举中传统左右翼政党均一败涂地的局面。但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英国的“单选区简单多数”投票制(First Past the Post,英国也是实行这一制度的唯一欧洲国家)。据统计,在2017年大选中,有68%的选票被浪费(即投给没有当选的候选人的选票,或者是超过获胜所需票数的选票),而在其中5个选区,有90%以上的选票对结果毫无影响。^①如果英国实行比例代表制,也许会彻底改变现有的政党政治格局,如同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情况一样。

当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此前相比,工党和保守党在英国政坛的垄断地位并非不可改变,英国政党体制向碎片化和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还是比较清晰的。在地区层面(特别是苏格兰)和欧洲层面,这种多元化甚至是多党制的特征更加明显。脱欧仅仅是这一发展趋势的“助推器”,其真正原因在于社会深层次的分裂。如果两大主要政党无法重建基于社会共识的政治共识,无法重建选民对传统政党的信任,则不排除英国未来也许会有向“多党制”发展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李靖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Jess Garland and Chris Terry, “The 2017 General Election: Volatile Voting, Random Results.”